



陈旋波
／ 著

时与光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与光——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讦/陈旋波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80647-594-X

I. 时... II. 陈... III. 徐讦(1908~1980)-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256 号

书 名:时与光——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讦

作 者:陈旋波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

字 数:23.5 万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80 元

ISBN 7-80647-594-X/I·385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孔范今

三年前,旋波君就拿定主意要做一部别开生面的徐讨论。他说,他不想把它做成一般意义的徐讨论学术专论,而是要运用文学史整体观的方法,通过对徐讨论文学个案的微观分析,厘清其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历史联系,凸现其创作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从而在宏观上把握徐讨论思想与创作的基本脉络,最终揭示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意义。

当时,我曾为他这一决定所激动。但在激动的同时,也未必没有几份担心。这一则是缘之于这一特定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徐讨论的一生,有数次人生空间的大转换,而为其所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又具有极大的时空跨度,要对其不断探索求进的创作内蕴和处于积极创生发展中的艺术追求给出准确可信的阐释,将是十分困难。它所要求于研究者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熟悉文学知识系统的问题,要取得与它进行对话的资格,还必须对中外文化尤其是哲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有着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融会贯通的深化心得,并能在跨学科的广博视野中以文学的会心作自由的运思。不然,将难以走进徐讨论。而另一方面,则是有感

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传统与现实。在数十年以来中国内地的文学史建构中,徐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对象,有的史著虽有提及,但也大都在评价上有失公允。近些年来徐訏的命运虽大有改观,正经历着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偏见而趋向于公允的被接受的过程,关于他的比较接近于对象而且颇具新见的论著也有所出现,但是,要把他置放在中国新文学史的整体框架内作出超越一般个案研究意义的史的评说,又谈何容易!因为,这将意味着对传统新文学史史观的根本性挑战。试想,不论是在以政治革命为基点还是以文化启蒙为基点的文学史价值观中,哪里又会有徐訏的立足之地?而要对文学史观进行根本性调整,那对一个研究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令人高兴的是,旋波君想要做的事终于做成了。难得的是,他把这种事当做自己的人生志业,做起来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据我所知,他是穷三年的精力集中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殚精竭虑,辛苦备尝,做得实在是并不容易。现在,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论著,就是他这一研究的结题成果。我曾有幸先睹为快,依我的感觉,他的目的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我以为,这部论著的最为成功之处,是它率先如此系统地对置身于不断变易甚至转换的历史语境中似乎是难以捉摸的徐訏,作出了可信的动态性的阐释,并在对其难解之点的破译中生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理论意识。这部论著给人的感觉,不是对既有知识的编码,而是智慧性的发现和氤氲着理论生成朝气的开拓性之作。

徐訏是20世纪的30年代踏上文坛的,从那时起他就已经

是一个难以解说的对象。30年代的文坛,已呈现为一种多元性分化、对峙又互相牵制的局面,而在这一多维性文坛结构中,徐訔与它们各有牵连又各不相同。他先曾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创作过一些有着明显左翼倾向的作品,但同时又从康德、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那里汲取异质性的文化思想,从而在创作上最终与左翼文学分道扬镳。而他对新感觉派的兴趣既昭示着他有着自觉的现代都市文化意识,同时也表明其已经逐渐从社会实践美学向着个体感性美学的转变,然而却又终因不能认同那种凸现都市感性物欲的做法而没有成为新感觉派作家。由此,他又接近了周作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京派所倡导的艺术观显然对徐訔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他也没有完全服膺这种艺术表现派的超功利文学观。对此,旋波君在论著中一一进行了细微的辨析,指出:徐訔30年代的文学活动是在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和京派之间的综合性结构能力之中进行的,在诸种文学力量作用下,其自身多种文学观念和文学选择的对峙、抗衡和融合正暗合了当时整体性的文学动态格局。正是这种不时调整其美学选择的态度使徐訔能够从30年代多元文学世界中获取综合的创造性经验,为他40年代独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想艺术资源。

十五六年前当我重新审视并试图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对象,开始着手编选《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明天出版社1990年出版)时即发现,40年代文学远不像原来讲得那么简单。40年代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和由其所彰显出的走向文化综合的新趋势,以及许多作家逼向生命内部体验和意义思索的审美创造的新追求,着实让我很是兴奋了一阵。但我也同时发现,要对这种

现象作出准确而深刻的阐释那也是很难的事。譬如对徐訏,就是一例。与30年代的徐訏相比,40年代的徐訏具有更深层次的阐释难度。很能引起我的共鸣的是,旋波君的这部论著着重讨论了徐訏40年代文学创作的生命体验性倾向,并有意识地由此凸现4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论析中论者引入了“生命体验”和“体验美学”两个概念,借以准确把握40年代徐訏那种异质性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其阐释性语境中,“体验”不是一般认识论意义上“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或“亲身经历”的经验性活动,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源于人的个性生命深层的对人生重大事件或精神活动的深切领悟。近代的“体验美学”是在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乃至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旨在探寻生命深层内核的人本主义恰恰正是40年代徐訏最主要的思想来源。该论著重点阐发了徐訏40年代参酌柏格森哲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及存在主义思想而向生命深层突进的艺术理路,指出他孜孜探索的问题已从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人本的心理与美学领域,认为他是以“直觉”与“原型”的生命体验方式表达了一种迥异于历史进化的心理时间和存在时间的维度,表达了对人类爱情原型的深沉梦想,从而展开了其漫长的超越现实历史的生命追寻历程。战争一方面造成了40年代中国作家颠沛流离的苦难经验,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这种人生经验的描述者和升华者,使他们发现了生命原有的美丽与庄严,发现了具有人类整体价值的精神向度。40年代徐訏始终关注着那场民族的战争,同时也始终透过战争本身去发掘生命的隐秘,去追寻生命的超越性意义,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鉴于40年代徐訏、无名氏、钱锺书和张爱玲等

作家的小说创作在爱情叙事框架下表达哲理玄思的共通性,旋波君提出了“中国现代玄学爱情小说”这一新的文类学概念,试图借此阐明在40年代中国文学里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哲学追求,从而揭示“文化综合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性特质。

这部论著进而分析了该时期徐讦小说雅俗整合的艺术形态,为40年代中国文学雅俗融合的历史性特征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求证。雅俗文学关系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聚讼不断的问题。五四新文学乃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为了维护文学的历史功利性价值,对娱乐消闲功能的通俗文学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而导致了在20至30年代文学时空中雅俗文学之间极为鲜明的对峙分野局面。而到了40年代,徐讦、无名氏、张爱玲等人终于完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雅俗整合的基本形态——他们真正确立了文学消闲娱乐功能的合理地位,实现了雅俗诗学的整合;他们还原了小说的基本叙事功能,突出了小说的故事性特征;他们在文学实践上实现了雅俗的整合与会通,使时代感悟、生命体验及形而上追寻等高雅主题与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内在结构之间构成了有机的动态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雅俗整合的成熟形态。该论著对此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同时,还借鉴结构主义方法,着重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分析了徐讦小说的雅俗整合特征,使徐讦小说的艺术成功奥秘获得了新鲜的解释。旋波君认为,从动态结构上看,40年代徐讦小说的雅俗整合是生命体验主题与通俗性情境之间水乳交融般的生成过程。通过对徐讦小说之功能序列结构的深入剖析,他发现它的局部存在着一个相当恒定的通俗文学叙事模式,即运用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叙述语法,使小说的静态结构上具备通俗文学成功的艺

术条件;同时也发现徐訏小说整体上存在着一个以生命追寻为基本动机的叙述框架,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的通俗套式转换成生命体验性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雅俗之间的对峙被完全消解了。这些见解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对于徐訏香港时期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文学选择,这部论著也有颇具见地的描述和阐释。旋波君认为,1949年徐訏离开上海并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其香港时期的小说创作呈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路向:一方面以写实的笔法真实地反映了移民的漂泊人生,并从中寄托了自己的放逐感受,表达了强烈的原乡意识;另一方面在体验美学的引领下继续沿着40年代“玄学小说”的生命追寻轨迹,徜徉于心醉神迷的生命情境,最终在糅合了佛耶思想的宗教世界中找寻到生命的安顿之所,从而完成了其探求生命终极意义、渴望精神超越的文化苦旅。神秘超验的宗教归宿为徐訏的精神历程画下了美丽的休止符,他并由此确立了“宇宙和谐”的生命新信仰。不论在思想意蕴还是诗学建构上,《彼岸》、《江湖行》和《时与光》等生命体验型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主题类型的作品,成为徐訏后期创作的典范。这个描述和判断,在我看来,也是大致不差的。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论著最后从香港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中审视了徐訏的历史性地位。该论著发掘了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香港文学史实:徐訏50年代初期就是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那些表现个体生命体验的小说有着显明的现代主义主题表征和艺术特点,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发展中起了开拓性的作用。这就有效地厘清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线索。同时还指出,在50至60年代中国文学海峡两岸

因政治原因而形成的极端对立的文学格局下,徐訏香港时期小说秉承着自由主义的创作理念,凸现了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其一,展现历史转折过程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向历史发出一种逆向性的叩问,从而丰富了 50 至 60 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维度;其二,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追寻过程,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人类心灵探索的史诗性作品,从而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涵;其三,坚守自由主义状态下的个人写作立场,摆正文学的功利性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关系,保持艺术上的纯洁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拆除长期以来因文学功利性而形成的雅俗对立格局,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在自身美学尺度上达到它应有的品位。至此,一个活跃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时空和意义结构中的徐訏,就被解说得玲珑剔透,像一位久违的朋友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当然,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开拓性的研究常常是并不完美的。就这个课题而言,有些问题还应做更深入、细化的研究,我想,旋波君自己,大概也有这样的想法。

对旋波君来说,这部论著是他学术之旅中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起点。我祝贺他的现在,也更期望于他的将来。

目 录

序.....	孔范今(1)
导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	(1)
第一章 对峙的多元:徐訏 30 年代的文学选择	(19)
第一节 徐訏与左翼思潮	(23)
第二节 多元的思想择取:徐訏与康德、柏格森和 弗洛伊德	(35)
第三节 现代都市叙事:徐訏与新感觉派	(48)
第四节 美的距离:徐訏与京派美学	(71)
第五节 徐訏与《人间世》、《天地人》杂志	(85)
第二章 生命体验下的文学创造	(101)
第一节 生命体验与体验美学	(101)
第二节 生命的时间体验	(117)
第三节 原型与幻觉:生命的神秘体验	(137)
第四节 情与思:中国现代玄学爱情小说的生成 ..	(155)
第三章 雅俗的整合与会通	(175)
第一节 从雅俗对立到雅俗融合	(175)
第二节 生命与形式的遇合:雅俗整合的动态构成	(190)
第三节 恒定:雅俗整合的静态结构	(202)

第四章 流放与皈依:徐訏的香港时期	(225)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文化苦旅	(225)
第二节 漂泊与原乡:徐訏的香港故事	(246)
第三节 宗教:生命的永恒归宿	(263)
第五章 徐訏的文学史意义	(283)
第一节 徐訏与香港现代主义文学	(283)
第二节 徐訏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296)
结 语	(311)
附录一:徐訏研究之述评	(314)
附录二:徐訏年表	(327)
参考文献	(331)
后 记	(337)

导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格局中的徐讦

一

法国当代著名学者让-伊夫·塔迪埃在《20 世纪的文学批评》一书的“导语”里开门见山地说：“20 世纪里，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① 这虽然是对西方世界而言的，但它似乎也符合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确实的，肇端于王国维和梁启超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一开始就显示了会通中西的创建性气势，试图以一种同中国传统批评截然不同的文学知识系统来诠释生机勃勃且业已纳入世界文学体系的现代的中国文学现象，并由此创建“不朽”的文章功业。对此，梁启超颇有自信和雄心，其《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以磅礴语气敬告当世学者：“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

^① [法]让-伊夫·塔迪埃：《20 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一国?”^① 梁氏谈的是学术,岂不包括他自己津津乐道的文学研究? 王国维则从西学东渐中发现了文学批评的前景:“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② 他意识到,在中国学术思想继佛学之后第二度受外力影响的时期,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整个学术思想将发生巨变。事实正如王国维所预料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无疑是在外来的知识系统基础上创设的,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成仿吾、茅盾、冯雪峰、胡风甚至沈从文,莫不如此。然而,另一个事实是王国维所没有料到的,即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那种旨在为现实主义张本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成为主导性的批评话语。这倒是被梁启超这位极力强调文学社会功利性的启蒙思想家言中了。左右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势力”正是从他那里发轫的,经过五四时期鲁迅、茅盾对法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吸纳与充实,再经过30年代鲁迅、冯雪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实践,最终在周扬那里形成了规范性的批评话语。揆之于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这种话语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自不待言,它是近代以来在民族自强和阶级解放等历史中心动作推动下文学必然性选择的思想产物。问题在于,这种主导性的批评话语在彰显文学的功利性价值的同时,也可能遮蔽了文学的其他价值,尤其是文学作为审美体验和作为娱乐消闲的基本价值,由此,王国维以来的超功利主义一脉在20世纪文学批评实践中被挤入边缘地位,从而导致了20世纪

①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中国文学批评的某些“失语”现象,也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构建长期处于依傍单一标准的尴尬状态。

确实,对于 20 世纪丰富复杂的文学创作而言,强调文学功利性价值的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着一个“阿喀琉斯的脚踵”:当在揭示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的意义时,它显示了无以伦比的理论活力;但当它在把握文本的审美意蕴和娱乐价值时,又往往力不从心。由此看来,在这种主导性的批评话语及借此形成的文学史观审视下,徐訏这位孜孜探寻个体生命体验、标榜文学审美向度以及沟通雅俗分界的独特作家之被长期忽视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中缘由虽然比这复杂得多,但文学观念的偏差无疑是难辞其咎的。暂且撇开作品质量不论,单从量的角度看,徐訏自 3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所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评论估计达二千万言。60 年代台湾正中书局编辑出版的《徐訏全集》竟多达十八集,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后期诗歌和文学专论,徐訏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最多产、创作最全面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徐訏本人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是相当自信的,据说他计划要把自己的全集译成英文。^① 对于如此著作等身、且被伯图西奥里等汉学家誉之为“在 20 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的作家^②,80 年代之前的大陆文学史只字未提,台港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也仅是略有论及,难怪徐訏愤激地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失败最无成就的则是文艺批评”,“在没有文艺批评的社会里作为一个

① 映芝:《三言两语悼念徐訏》,《海洋文选——美洲〈华侨日报〉文艺副刊作品选集》,香港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280 页。

② 参见陈乃欣等:《徐訏二三事》,台湾尔雅出版社 1980 年版。

作家是特别寂寞的”^①。在写于1965年的短文《文学批评》里，他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批评除提及了推崇非功利审美主义的王国维、朱光潜和宗白华三位批评家之外，几乎是整体性的否定。徐訏自然对“一切的文学批评都属于政治”的大陆学界不满，他所寄望的理想的批评家是：

他必有他在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上有所立，据此而清算过去，他一定会大刀阔斧的发掘前人所未看到的，可能否定了一个一直被视作偶像的诗人，可能肯定一个从未被人注意的作家，据此而开创未来。他一定会注意到尚未被人注意的新作家，一定会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作品。^②

遗憾的是，50年代以来，如此独具慧眼的文学批评家并没有真正出现，大陆不用说，就是香港的李辉英和台湾的周锦在70年代也仍然依照着社会功利的文学观来评价徐訏——对于徐訏40年代小说独特的艺术创造，他们或说“对于我们的抗战大业多少是起了消极的作用”^③，或径直认为“这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无益处”^④。可见，由于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支配作用，当时学界对徐訏的误读或漠视可谓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1980年徐訏逝世之后，港台学界也逐渐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历程产生了较大的关注。特别是80年代以来港台文学批评呈

① 《徐訏全集·后记》，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初版。

② 徐訏：《文学批评》，《街边文学》，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版，第199页。

③ 李辉英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东亚书局香港文学研究社1970年版，第268页。

④ 周锦：《中国新文学史》，台湾长歌出版社1977年版，第655页。

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一方面是社会历史批评与新批评、阐释学、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诸种批评方法有了互相渗透的趋势,文学批评渐渐走向宽容与理想,另一方面愈来愈倾向于发掘文学作为文化之一环的独特性,注重考察整体性的文学历史,重视文学与精神史的联系。在这种批评语境下,徐訏研究也逐渐成为港台的学术热点。台湾尔雅出版社在徐訏逝世一个月后即出版了《徐訏二三事》一书,许多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专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了徐訏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港台徐訏研究的开展,香港学者黄康显后来在此方面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与此同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中国大陆文学及文学批评也渐渐恢复了活力,那种通过复活“五四”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回归文学自身价值立场而形成的新文学观念必然为徐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98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首先分别重印、影印了《风萧萧》和《鬼恋》,而“迟到的批评”则发端于1989年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①。严著从流派的角度把徐訏和无名氏界定为“后期浪漫派”,并揭示其艺术特色。1990年《风萧萧》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今主编),成为那时学界了解徐訏作品的重要来源。随后,孔范今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切入,指出徐訏和无名氏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中的后期现代派”^②,从而大大拓展了徐訏研究的学术视野。其后吴义勤出版了学术专著《漂泊的都市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悖论与选择》,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

之魂——徐訏论》^①，全面考察了徐訏生平与创作的基本脉络，对徐訏各类作品的文本价值都有独到的探讨，后来他又着重分析了徐訏小说创作方法的复杂性。崭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引入、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香港文学研究的深入，都为这时期徐訏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了足够的条件，吴福辉和许道明从海派文化审视徐訏小说的艺术取向，刘开明和冯奇对徐訏作品浪漫特征的发掘以及李宪瑜和孔庆东对徐訏作品雅俗融合特征的描述都表明着徐訏研究的深化。^②

应该说，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台港还是海外，徐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关键问题还有待解决，诸如：徐訏与3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尤其是与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和京派的复杂关系；徐訏40年代小说奇谲风格的人本主义哲学基础，包括柏格森、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形成徐訏艺术特征的重要作用；徐訏小说的“生命体验”与“生命意义追寻”与40年代中国文学基本价值取向的内在精神联系，徐訏40年代小说之打通雅俗文学分界的内在机制和结构分析；徐訏香港时期小说对“漂泊”与“原乡”等20世纪华文学母题方面的延续与拓展，对生命追寻主题的深化，尤其是其创作选择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性意义以及在整体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的文学批评所能解决的，它们涉及了诸种文学思潮、文学运动、阶段性的文学时代特征以及宏观的文学史等广阔丰富的内容。

① 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著对本书写作启发甚多。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引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一书及徐訏《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书文字，除特别标明外，皆转引自吴著，页码不一另注。

② 参见本书附录一：《徐訏研究之述评》。